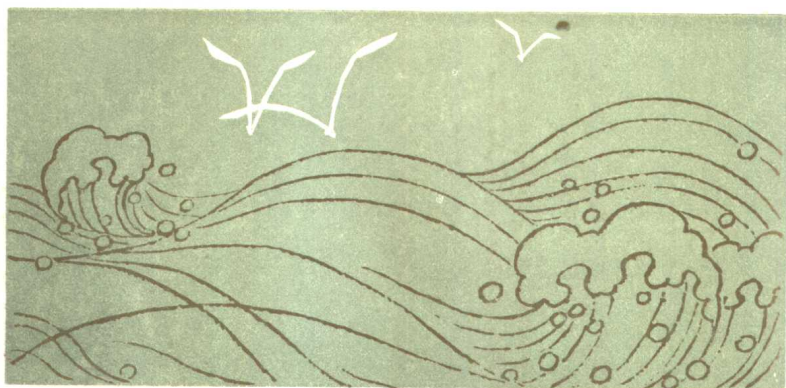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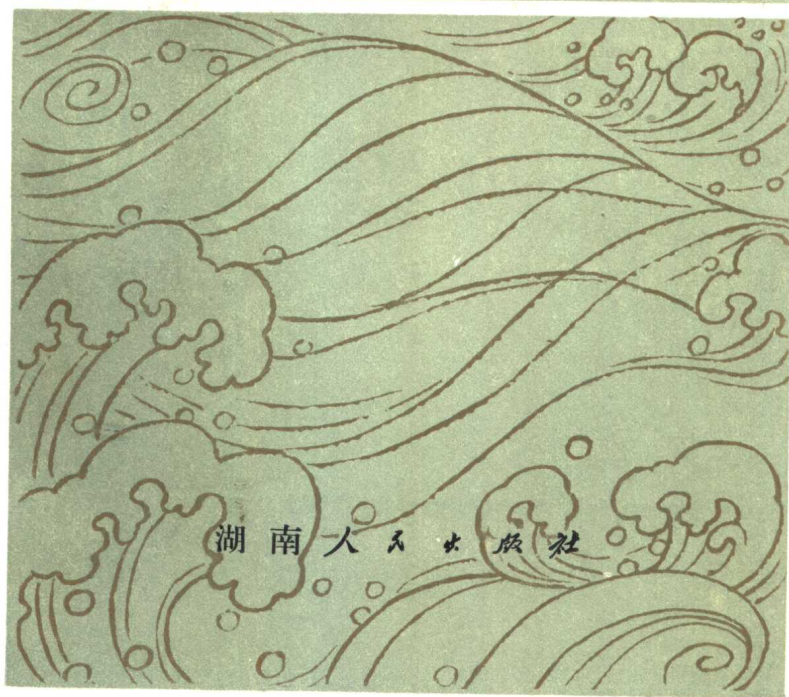




峥嵘岁月

ZHENGGRONGSUIYUE



峥嵘岁月

第 四 集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长 沙

峥嵘岁月

第四集

责任编辑：肖屏东 黄鹤逸

装帧设计：曾东凡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28,000 印张：18 印数：1——4,300

统一书号：11109·210 定价：0.97元

目 录

龙门的农运斗争·····	张令彬 (1)
水口山矿罢工见闻·····	刘亚球 (15)
会昌之战·····	吴树隆 (24)
湖南暴动纪略·····	李克如 (29)
井冈山斗争亲历·····	李克如 (44)
千里迢迢为找党·····	袁任远 (71)
创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片断回忆·····	袁福生 (76)
易家湾歼敌二、三事·····	裴周玉 (85)
七七事变后的湖南地下党·····	高文华 (93)
游击斗争忆旧·····	王来苏 (105)
二十年打个回合 ——解放广西的回忆·····	莫文骅 (130)
战斗的历程 光荣的业绩 ——回忆解放湘西·····	晏福生 (148)

质 疑 · 辨 误

关于湘鄂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蹇先任 (173)
-----------------------	-----------

怀 念 集

我所知道的何叔衡同志·····	姜国仁 (187)
难断的情思 ——忆罗荣桓同志在战争年代的革命事迹·····	陈海涵 (205)

难忘的李灿同志·····	李寿轩 (236)
怀念姚喆同志·····	李寿轩 (250)
李六如同志的一段亲历·····	王美兰 (258)
在彭绍辉同志身边工作一年·····	沈仲文 (269)
怀念任作民同志·····	宋辛夷 (275)

英烈谱

曾中生传略·····	盛仁学 (283)
左权(一九〇五——一九四二年)·····	王孝柏、刘元生、贺顺庚 (293)

革命文化

忆战地写生队·····	黄肇昌 (301)
-------------	-----------

革命小故事

朱总司令教我打草鞋·····	黄战友 (310)
巧擒敌探·····	方福钦 (312)

龙门的农运斗争

张 令 彬

我的老家龙门区，在湖南省平江县，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在旧中国，这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地方。由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的残酷压迫，加之连年的天灾和军阀混战，千百年来，这里的劳苦大众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饥寒交迫中苦撑着。他们象一堆堆烘透了的干柴，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就会燃起冲天烈焰，成为燎原之势。

我在这个不平的世界上，饱尝了辛酸和困苦。从九岁开始，就在裁缝师傅家里当过学徒，在地主家里做过长工，在纸棚里干过踩麻的苦力。我的汗水和广大贫苦农民的汗水，一起浸透了一担担金黄的稻谷，但它却流进了地主的粮仓，填饱了土豪劣绅的肚皮，而我自己得到的，却只有饥饿、鞭痕和深深的仇恨。这是为什么？穷人的生路在哪里？我这样问着，龙门区所有的穷人也都这样问着。

要活下去，就要造反

贫苦的生活使人们走投无路，实在活不下去了，就起来造反。这是历史的必然。

一九二五年，正是大革命的前夜，社会动荡，人心不安，有些人就拉帮结伙，平江称为“顿杆子”。初春时节，只见一批又

一批的“杆子”在平江一带“顿”起。我的心也动了，便仔细观察和了解着他们那些“杆子”的主张和办法，也想造反，寻找一条生路。但那些“顿杆子”的人，并不为穷人办事，使我感到失望。他们有的刚刚“顿”了起来，就被地主收买过去，成了地主豪绅的武装。有的立了个山头，扩充自己的实力，独霸一方，称王称霸。这些“杆子”名义上是起来造反，实际上和地主武装、土匪并无两样，照样欺压穷百姓。甚至连离龙门不远的龙潭寺里的和尚吴艾，也“顿”起“杆子”来，自封为“司令”。知道了他们的这些情况，我就没有参加这些“杆子”。当时乡间流行着一句“劫富济贫”的口号，这倒使我非常向往。我寻思着：要是把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大家都能过好日子，那该多好啊！我的这个思想，不知怎么被一个叫张献夫的远房堂兄知道了，他是龙门区有名的大地主。一天，我们在龙门街上巧遇了，他用手指着我厉声地问：“听说你这个穷鬼也要顿杆子，起来造反呀？”我说：“穷得没有路可走了嘛！”他的声音更大了：“那就去做长工、去讨饭嘛！”我听了这话，怒火冲天，但也没好气与他争，便掉头走了。心想：“你等着吧！有那么一天，你会知道穷鬼的厉害的。”

端午前后，我们乡里一个有学问的人从北平回来了。他叫张勉之，大号张雨畴，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开始接触了一点革命的新思想。他回来后，看到平江这样乱，很多人到处“顿杆子”，自己也就买了四条枪，找我们几个当长工的给他肩着。

我扛上枪杆，心里很高兴，以为这样就可以去实行“劫富济贫”的理想了。谁知没过几天，平江县保安团长设了一个圈套，花言巧语，委任张勉之当保安团团副，要他把枪带到县保安团去上任。

张勉之当时有出人头地的思想，便把我们带到城里，刚一踏进保安团大门，一个长官模样的人把我们的枪拿走，说是替我们“保管”；保安团总假惺惺地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便打发我们回家。这时，张勉之才明白是上当受骗了。但保安团人多势大，他只好忍气吞声，带着我们连夜跑回了龙门。这次失败，给张勉之的教训十分深刻。

到了腊月（阴历十二月），年关将近，穷人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在“劫富济贫”的思想促使下，我邀集了几十个人，跑到地主家里去“吃大户”，强迫地主每天给我们做饭吃。由于我们人多，地主十分害怕，就这样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了半个多月，但穷兄弟们说：我们的肚子是吃饱了，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我心里也想：眼看就要过年，家里有些事要安排，长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便和大家商量，要地主交出一部分粮食分享给大家。地主巴不得我们快一些离开他家，就交出了一点粮食，我们高高兴兴地挑回家去，总算过了一个有饭吃的年。

我们穷人成年累月在田里耕种，却吃不饱，穿不暖，而地主老财，夏天拿把扇子，冬天抱个烘笼子，东玩西逛，家里却有吃不完的粮，这是为什么？我去问张勉之，他说：“地主都是靠收租、剥剥削穷人发财的。”我听他这话很有道理，就想到地主在管理“公积谷”时一定有贪污。刚过了年（一九二六年春天），我就组织一些乡亲，要把地主的帐算一算，看他到底贪污了我们多少谷子。可是要算帐就得有文化会打算盘的，我们都是些泥脚杆，谁会打算盘呢？只得由地主勾结的狗腿子来算。算来算去，结果白白费了气力，穷人们一粒粮食也没有得到。

龙门区有个恶霸地主，名叫张召泉，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一次，他坐轿出门，我们几个兄弟看见了，要打他的轿子。张召

泉恶狠狠地说：“你们这些穷鬼敢打我的轿子，我只要往县里说一声，你们都得乖乖地去坐班房。”我说：“坐班房我们不怕，你这顶轿子我们今天打定了，打了轿子，脚夫的工钱还得要你付。”我们几个穷兄弟涌上前去，七手八脚，把轿子打了个稀巴烂。张召泉咬牙切齿地说：“我非到县城去告你们不可。”我们根本不理，他只好步行回家了。过了几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吴仁江来找我，他正在张召泉家当长工，我们在一起学打拳的时候，他叫我师兄。见了面他对我说：“师兄，张召泉要我给你送来一百块大洋。”随手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接着又说：“另外还有十担谷子。他的意思是叫你今后不要造他的反了。”我看了看布包，心想：这不明明是拿钱收买我吗？难道我造反就是为了这一百块大洋和十担谷子？我冷冷地说：“给一百块大洋也太小气了。师弟，你去对张召泉讲，他就是给一千块大洋我也不要，我要的是所有的穷人都有饭吃！你问他愿意吗？”吴仁江只好悻悻而去。

张召泉对我收买不成，便来威吓。他勾结几个土豪劣绅，要到县里去告我，并散出空气说：县里的通缉令马上就下来，要捉我去坐班房。威吓也没有用，我仍和穷弟兄跟他们斗，以达到“劫富济贫”的目的。

组织起来，成立农会

经过将近一年各种斗争的尝试，我那“劫富济贫”的想法不但无法实现，反而落了个被通缉捉拿的结果。很多穷兄弟都经过了与我类似的斗争，也都失败了。为什么呢？我和张勉之、张赖勋等在一起议论，结果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我们的斗争都是分散的，一盘散沙是没有力量的，应该想别的办法。张勉之说：“听说别的地方成立了‘农民协会’。凡是成立了农会的地方，地主

就老实多了，穷人也有说话讲理的地方了。”我们一听这个办法不错，当时就商量，要赖勋到平江县城去，与平江县农民协会取得联系，就说我们龙门区也要成立农会。赖勋走后，我和张勉之积极串连穷兄弟，给他们讲：组织起来，就象五个手指头捏成了拳头，力量就大了。赖勋从县里回来，说平江县农民协会很支持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加劲准备，只要条件成熟了，马上成立龙门区农民协会。在县农会的支持下，我们的准备工作很顺利地进行着。我们又在一起商议，要办农民协会就要有领头的，张勉之有文化，有胆识，又见过大世面，我们就推选他当领头的人。张勉之并不推辞，他说：“要我来领头也可以，但大石头要有小石头帮衬，如果没有小石头的帮衬，一场洪水，就把大石头冲倒了。所以，办农会的大事，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办得成。”

不久，北伐军进驻长沙，平江县的农民运动更加高涨，我们龙门区也已完成了成立农会的准备工作，张勉之给县农民协会写了一封信，说了说我们的准备情况，要求正式成立区农会。县农会很快派来一个名叫陈翰生的特派员，负责指导龙门区的工作。他还带来了一块大印，上面刻着“平江县龙门区农民协会”几个大字。我们同贫苦农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在四肯堂祠堂门口挂上了农民协会的牌子，龙门区的农民协会便正式成立了。在祠堂门口还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国民党龙门区党部”，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秘密活动阶段，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是为了便于工作。就在农会成立之后不久的十月二十六日，张勉之秘密地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我才知道，我们龙门区农民协会一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和建立起来的，张勉之同志早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区农民协会领导成员分工是：张勉之当农会委员长，我做特

派员，张盘清为书记官。张盘清是个敢打抱不平的青年汉子，有文化，凡属公文书信之类，全由他一人包了，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革命热情很高，为龙门区农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农会成立后，我们首先把地主办的保安团解散了（当时区保安团长张元臣，是个比较开明的地主，他看到兴办了农会，解散保安团是大势所趋，故未加反抗），区的警察所也由农会直接领导和控制。后来又相继成立了农民自卫队，把娃娃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农民有了为自己办事、给自己说话的农会，一个个扬眉吐气，广大受苦大众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附近一些地方的农民（如土龙、木瓜），也都跑到龙门来，要求加入农会。在组建农会和开展各项活动中，涌现了一大批骨干分子，如张赖勋、张阜勋、张抑强、张曙樵、张建谷、艾伟林、张农喜等。曾被恶霸地主张召泉欺骗利用过的我那个师弟吴仁江，也积极参加了农会工作，并加入了青年团。

我这个区农会特派员，身兼数职：既是裁决农民对地主提出诉讼的裁判员、农民自卫队的队长、儿童团的指导员，还是农民夜校的筹款委员。经过一段实际的锻炼，特别是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之后，我原来“劫富济贫”的思想，已经逐渐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因而工作更积极了，日夜不间断地处理各种事物，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用不完的劲。我们三个农会干部，团结一致，许多大事，几个人一碰头就解决了。再加上大批骨干分子踏实埋头地工作，龙门区很快就掀起了农民运动斗争的伟大风暴。

劳苦大众，意气风发

农民协会把“为穷人撑腰，替穷人办事，保护农民的利益”作为最重要的原则，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

过去打官司都是穷人吃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了农会，穷人的腰杆子硬了，地主豪绅不讲理，欺负农民，农民就找农会来告他，农会就对地主豪绅进行处罚。地主豪绅只能乖乖地认罪负罚。

龙门地处山区，地主把土地占了，荒山也占了。过去农民要吃饭，就要从他们手里租田；农民要烧柴，就要到荒山上去砍树枝或割草。地主说山上的树和草都是他们家的，农民上山被他们捉住后，除了挨打受骂，还要罚钱。有了农会，穷人胆大了，就把地主拉到农会来论理。我们对地主说：“荒山是大家的，你不能独自霸占，农民做饭要烧柴，今后他们上山砍柴割草是合法的，第一不许打骂，第二不许罚钱。”地主慑于农会的势力，当面不敢说一个不字，连连点头说，保证做到农会的要求。平时地主豪绅若不老实，农民就会说：“带他到农会，找裁判员说理去，现在是农会的天下！”他们也就老实了。

为了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农会决定没收地主的田契。田契是地主的命根子，他哪能顺从地交出来呢？总是想方设法软磨硬抗。有的把坏田的田契交来了，却把好田的田契留着；有的只交一小部分，而把大部分藏起来；有的就是一张也不交。这时农民想了个好主意：要求农会发动儿童团到地主家去要田契。我是儿童团指导员，就按照农民的意见把娃娃们集合起来，到地主家里去。儿童团员的斗争精神非常强，天不怕，地不怕，勇敢得很。他们大声对地主说：“快把田契一五一十地交出来，要不就把你捆到农会去！”有些顽固家伙硬是死活也不交，还说娃娃们不在家放牛砍柴，到他家闹事。儿童团可不听他那一套，用一根绳子往地主脖子上一套，拉着就走，到了农会，地主就只好向农民协会求情、说好话。农会当然不听地主的，要他们马上交出田契，地主无法，

只得交出田契才算了事。

恶霸地主张召泉是个死顽固，横竖不肯交田契。儿童团就把他捆起来，拉到街上，拴在卖猪肉的屠凳下示众，什么时候交出田契来，就什么时候放他回家。人们听说张召泉被捆起来示众，便都赶来看。围看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又是笑又是说，张召泉的名声一下就臭了。他只得乖乖地交出田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回家了。当时龙门区农会的儿童团员，现在还健在的有张鸣阶（张平凯，原山西省军区政委）、裴昂泉（裴周玉，现任裴甲兵司令部顾问）两个人。

这些为农民撑腰、打击地主豪绅气焰的活动，使得劳苦大众扬眉吐气，更拥护和热爱农民协会，因此，会员人数不断增加，一些地方上念书的学生也跑了来，要求登记加入农会，龙门区农民协会在斗争中更加巩固和壮大了。

土豪劣绅，图谋反扑

农民运动斗争的形势向前发展着，土豪劣绅对它的仇恨也在增长着。随着变化了的形势，他们对抗的方法也在变化着。他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搞垮农会是不容易的，便想出了更为恶毒的一招。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造谣言，把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煽动起来，企图搞掉农会的领导，而后让听他们话的人来掌权，把农会控制在他们手里。对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来说，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农会性质、前途、命运的大事。

一九二七年春，大口墩乡有个姓吴的地主，偷偷散布谣言说：

“龙门区农会不是农民自己选出来的，区农会只替区里的人讲话，不为乡里人办事。”一天，地主利用狗腿子和与他们有些关系的人，邀集了二、三百不明真相的农民，浩浩荡荡从大口墩来到龙

门区。名义上是找农会说理，实际上是叫农会交权。当时区农会的干部大多不在，自卫队也在乡下，街上的群众见大口壕的人要闹事，纷纷赶到街口，关上札栏门，和他们说理。两部分群众互相对立，形势很紧张，处理不当，双方动起手来，就会造成伤亡。他们来的人又多，农会眼看有被他们占领的危险，如果农会的权被他们夺去，穷人就要遭到报复。张勉之同志和我商量了一下，让我出头去处理这件事。

为了应付万一的情况，我首先派人到乡下去，通知自卫队立即赶回区里，又嘱咐自动前来保卫农会的群众，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上坏人的当。我冒着风险，来到札栏门前的老祠堂门口，当众揭穿了那个姓吴的反动地主企图搞垮农会的阴谋。我对他们说：

“我们区农会是经过县农会批准成立的，我们有什么事办得不好，你们可以提出来，提得有道理我们就改，但是千万不要听信地主的谣言。农会是我们农民自己的，你们打到自己的农会头上来了，这对谁有好处？有谁会高兴呢？”开始时，他们叽叽喳喳不听我的话，当中有人说，农会的人讲话有道理，大家听听。后来大家便安静下来听我讲。我趁机讲了由于我们农会让地主豪绅丢了面子，打击了他们的势力，他们就象被挖了祖坟一样仇恨农会，千方百计要整垮农会。我说：“地主豪绅害怕农会，说明我们做对了，你们可不要上当啊！”我讲完话，他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早知道是这样，我才不跟着来呢。有的转头回家去了，还剩下一些人，劲头也不大了。我就叫他们派三个代表到农会来谈判。他们派的代表，原来都是被地主利用的狗腿子，三个代表一进农会，我们就把他们软禁了起来。正好这时自卫队已从乡下赶了回来，他们知道有人要打农会，都很气愤，把手里的梭标高高举起，还有的晃着大刀。那些知道已经上当的农民，一看自卫队一个个威风凛凛

的样子，都纷纷回乡去了，剩下的几个狗腿子，觉得身单力薄，也偷偷溜了。然后我们放了那三个代表，他们也只好灰心丧气地走了。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下来。我们从这一事件中得到了锻炼，也增长了才干，进一步认识了农民武装的重要性，没有自己的武装，革命成果是保不住的，因此，农会决定加强自卫队，除了把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编入自卫队进行训练外，同时又打了一批梭标和大刀，增多了自卫队的武器，这样战斗力就更强了。

农运烈火，越烧越旺

农民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愚昧、贫穷的广大农民，从千年封建迷信和种种礼教枷锁中逐渐地清醒过来，开始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前进，也在革命的烈火里冶炼、成长着。

“人的命运，是命中注定的。”这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愚昧统治的枷锁之一。不打破迷信思想，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不打破封建迷信的枷锁，人们的思想就不能解放。

我们对群众说：

“千百年来，我们给庙里的泥菩萨烧了多少香，磕了多少头，有谁见过菩萨保佑过一个穷人？”

“年年岁岁拜土地公公、土地奶奶，辛辛苦苦打来的粮食，还不是要往地主的粮仓里送？”

“灶神爷天天享受我们的供奉，我们的锅里还不是没有米，我们的碗里还不是没有饭？”

农民认为我们讲的有道理，就和农会一起打菩萨，打土地公公，拆土地庙，把灶王爷扔到茅厕里。有些地主背地里散布谣言说：“得罪了菩萨，是没有好报应的。”可是过了好一段时间，

菩萨也没有来报应任何人。农民们知道了这全是骗人的把戏，明白了这是封建地主阶级迷惑人民维护他们统治的一种手段，与迷信斗争的信心更足了。

妇女是一支伟大的力量，但这支力量千百年来却被残忍地压抑着。她们没有婚姻的自由；不能和男人一样参加社会活动，她们的精神和肉体都承受着巨大痛苦。农民协会把解放妇女、发动妇女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提出了“女人放脚”、“男女平等”、

“反对包办婚姻”等口号。一些年轻的妇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家庭的阻拦，砸碎身上的枷锁，勇敢地剪短了头发。她们活跃在农会的一切组织里，和男人一样，夜以继日地开会，商量打土豪等大事，显示出了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力量。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对于女人和男人在一起开会、工作、参加农会运动，十分看不惯，偷偷地骂：“这还成什么体统！”有的还把自己的女儿、媳妇关在家里，不许出来。一些反动地主则趁机造谣：“共产党要搞共产共妻了。”为了教育群众，我们首先抓住造谣的地主狠狠地打击，揭穿他们的谎言，然后发动青年人和妇女、儿童团积极开展工作，通过公开讲演，个别说服，摆事实说明妇女受苦受罪、被压迫被剥削的道理，启发和教育群众。这样，妇女很快地发动了起来，农会的工作也更有生气，还涌现了张鸣阶（张平凯）、裴昂泉、方志、张北林、张金楼、艾奇、张湘湘、张倚罗、梅馨、银镯、曾玉姣、谭梅等一大批伢子和妹子，成为农民运动的生力军。

对于一些群众坚决反对的事，农会采取了积极支持群众的态度。比如赌钱和抽鸦片烟这两件事，往往是家庭纠纷、社会犯罪的直接原因。有人就是因为赌钱和抽鸦片烟，弄得家破人亡。我们一方面采取行政措施，发出布告：“严禁开设赌场、烟馆，查绝赌

钱、抽鸦片烟之行为，违者必从严罚处”；一方面向群众做宣传说服工作。讲清这些恶习，“一害个人身体，二害家庭和睦，三害社会安宁”。这些措施和宣传，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说农会好话的人逐渐多起来了，连那些七老八十的比较封建顽固的脑袋瓜，亲眼看见农会替他治住了赌钱、抽鸦片烟的子孙，也都伸出大姆指，夸“农民协会好”。

龙门区的农会得到巩固后，我们又先后成立了下属六个乡的农民协会。由于工作多了，区农会也增加了七名干部。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我们都在自己家里吃饭、睡觉，但工作十分努力，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增加的七名干部是：负责本区各乡联络，调解地方上农民纠纷的张抑强；负责地下党的发展和组织，准备建立区工会工作的手工业工人张赖勋和张卓勋两兄弟；负责妇女工作的张湘湘和张倚罗。这两位女同志虽都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但在反对封建迷信、争取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工作中，热情高，干劲大，为农运斗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还有一个叫张建谷，一个叫艾倚林。这些农会骨干，除了张抑强同志后来和我一起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外，极大多数都先后光荣牺牲了。对于他们的业绩，龙门区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秋收起义，继续向前

正当我们的斗争如火如荼向前发展的时候，意外情况发生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我在乡下工作几天后回到区上来，张勉之对我讲，县里来了一个人，要我们不要抓农民自卫队了，不许共产党员当自卫队长。我一听这事，心里直往上冒火，说：“这是谁的主意？”张勉之说：“是谁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上面的指示。”既是上面的指示，我不好硬顶，但脑子里老是在想：在